

雌雄同体的“她者”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宋碧云《啼笑皆非》汉译研究

黎昌抱 李 菁

摘要: 本文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以宋碧云《啼笑皆非》汉译为例,从译本选择、译语操控、翻译目的、译者认知和视阈融合等五方面分析了雌雄同体的译者主体身份及特定时代背景对译文重建的影响。本文认为,译者作为独立于原文及其作者而存在的翻译主体,其译者主体性自然地受到来自于自身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倾向及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原作在语句文意、文本结构乃至作品立意作出一定程度的润色和修正。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不仅精准记述了译者对于作品文本的主体操控,更是清晰描绘了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路径。这一系列的改动最终使时代译作得以脱离作者意志,并在新时期背景下获得其独立的文本意义,从而焕发新生。

关键词: 宋碧云;《啼笑皆非》;译者主体性;雌雄同体

[中图分类号] H315.9

DOI: 10.12002/j.bisu.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7)02-0055-15

引言

有感于时局多艰、国势积弱,林语堂于1943年在美历时一月挥笔写就*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巨大反响,雄踞当年全美十大畅销榜单之列。作为一位知名的台湾本土女性译者,宋碧云在数十年的专职译者生涯中,凭借其深厚的英语功底和国学底蕴成功翻译了海内外的数十部名家大作。相较于其译作的广为流传,针对宋碧云本人及其翻译作品所展开的相关学术研究却鲜见于当今学界。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其内容往往聚焦于《苏东坡传》《老人与海》这两部译作,仅有3篇论文对《啼笑皆非》汉译有所涉及。何明霞和汪桂芬(2001)将《老人与海》海观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宋译本在还原原著语言风貌方面比海观译本略胜一筹。冯小巍(20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视野下中国题材外语作品无本回译研究”(项目编号:16BY011)以及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性别主义视角下《啼笑皆非》林语堂自译与宋碧云他译比较研究”(项目编号:ZCYZ201426)阶段性成果。

从艺术美学角度入手,根据读者美学享受、美章哲学意义及读者心理倾向对海观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进行艺术阅读的分析研究,并对各自特点加以比较客观全面的评述。吴任玉(2012)从关联理论视角对《老人与海》吴劳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进行研究,指出两位译者为追求最佳关联而采取的不同手段,并对两者因语言、文化和读者认知环境及意义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所产生的局限进行阐述。余健明(2009)则以风格标记符号体系为理论依据,借用语料库软件对《老人与海》原作及其现存五大代表性汉译本进行量化分析,指出它们在各个语言层面上的异同。在《苏东坡传》翻译研究中,赵佳佳(2013)和霍郭浩(2015)都借助于语料库手段对张振玉译本和宋碧云译本中所展露的译者风格进行了量化对比,试图探究两个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的不同之处,认为宋碧云译本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合乎普通读者偏好。在《啼笑皆非》翻译研究中,陈蕙荃(2009)将林语堂自译本和宋碧云汉译本进行了对比,从词汇、句法、语篇、美学等四个层面分析了两者的不同,指出自译者因作者译者双重身份所赋予其对原文信息的透彻认识,使得其能够将写译结合,创造出最理想的译作。而冯欣欣(2011)则将研究的眼光投向林、宋两位译者的实际翻译策略,并将所涉相关因素加入考量,认为林语堂由于自身作者身份和双语背景及深厚的中西文化造诣等因素影响使得其能够在译文中加注大量内容,打破了原文和译文间的分隔,一举创造出“最为忠实的翻译”。为此,本文拟立足译者主体性视角,以《啼笑皆非》宋碧云汉译本为例,结合女性译者“雌雄同体”的特殊身份,探析其译者主体性在译本构建过程中的影响,进而探究新时期背景下政治作品的重生之路。

一、译者主体性概述

译者主体性(translator's subjectivity)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三者相互作用“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查明建、田雨,2003:22)。能动性,作为“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和“最根本的综合特征”(陈大亮,2004:4),是译者走出原有视阈的限制,不断追求译者视阈和读者视阈融合的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调动自身的“情感和意志”,将“审美力”和“想象力”带入翻译实践之中,进一步挖掘原作中的内涵和意蕴,促使其个人理解得以“有机地融入语言转换中”,最终创作出优秀的翻译作品(夏贵清,2004:90)。由于译者间天然存在的个体差异,使得不同译者均有权依据个人的理解进行翻译,其表达方式和翻译策略也因此存在

着相当的多样性(方梦之, 2003)。在肯定译者主体能动性的同时, 我们仍需意识到译者翻译时必然受到来自“边缘主体”(即原作者)、语言系统及其文化规范乃至译者自身因素的影响, 其主体性的发挥也因此有所受限, 而这些限制正是译者受动性的表现(屠国元, 2003: 9)。“目的论”认为, 任何行为都带有一定的目的, 即“为我性”, 翻译行为的过程都“由目的所决定”, “翻译活动的目的可以解释特定译者的翻译策略”(Nord, 2001: 73)。换言之, “目的原则”是翻译活动的最高准则, 译者的一切翻译行为都为其目的所服务。在翻译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下, 译者作为传统译学视角下“隐形的”“雌性的”存在, 为彰显其个人意志、促成其翻译目的, 将势必在翻译的过程中同时受到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方面的影响, 而其貌似波澜不惊、一气呵成的译文字句之下实则暗潮汹涌, 时时充斥着“自我与她者、自主与受动、自由与束缚的矛盾”(仲伟合、周静, 2006: 45)。为满足特定的翻译目的,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传统译学定义下的阴性附庸身份进行对抗, 以争取对作品内容、结构上的等同于原作者的、“雄性的”主导权和创造力, 因此译者的翻译过程实则是其原有“雌性”身份和主体“雄性”意识的交锋, 是译者主体性与“忠实”标准的对立与融合, 更是积极和消极的辩证统一, 任何一个成功的译作其本质即译者在“雌雄同体”理想状态下的最优产物, 因此在研究时偏重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定将导致对译者主体性的片面化理解(同上)。

二、译者主体与译本重建

受制于二元对立的传统译论, 长久以来译作都被视为“低弱的、派生的”“她者”, 被迫屈从于“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原作, 而无法获得其独立的文本身份和文化价值(许宝强、袁伟, 2001: 304)。因此, 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 翻译因其“次要”身份成为了女性惟一被允许从事的文学活动(Chamberlain, 1988: 470)。而在现行英美法律中, 翻译仅仅被定义为译者的“委托作品”(work made for hire), 是一种“基于拥有著作权的原创作品”的“改编作品”(adaptation)或“演绎作品”(derivate work), “其著作权, 包括演绎作品或改编作品的专有权均属于作者”(Venuti, 2006: 8~9)。正是受这种原作中心论思想的影响, 译者往往受到原作束缚, 竭力贴近原作风格, 苛求译作在语义上的“忠实”和语言上的“通顺”。但与此同时, 其作为独立人的主体意识又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内容进行一定的改动。因此, 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主体与原作主体间的矛盾与融合。作为“阴性”译者, 宋碧云在翻译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时,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国内外时局及其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 其译作也因此从句、语篇等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删改增注, 操控痕迹较为明显, 可被视作为其“雌性”译者身份与“雄性”主体意志冲撞交织的产物。而这些对文本内容的改动和对作品结构的重建均能结合译者的主体意识, 从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三个方面得到详细的阐释。

1. 能动性: 雌雄同体的译者

身为译者, 其第一要务即忠实, 且忠实的对象决不应仅限于原作及其作者, 更应将翻译活动的发起人、赞助人及出版编辑等纳入其考量之中。因此多数时候, 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 难以自主自愿地进行挑选, 更有甚者为保生计, 只得随他人调配, 遣词造句均听从他人意志, 仅代“口舌之劳”, 彻底沦为了翻译的“工具”, 其作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就荡然无存。不同于沉默的大多数, 作为“阴性”译者的宋碧云一直渴望摆脱传统译论的礼教束缚, 获得平等于作者的话语权力, 即从劣势的阴性的译者转变成为一个“雌雄同体”的翻译合作者。“雌雄同体”(Androgyny)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其重在强调人的社会性别(gender)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 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不同生理性别角色分工、社会期待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 因此个体完全可以“同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 即超越生理性别间的阻隔, 呈现“双性视角”(李文静、穆雷, 2008: 98)。正因如此, 被传统二元对立男权译论所定义为“她者”的作者便由此找到了获取介乎于原文作者和传统译者间的“双性角色”和“双性视角”的可能。这种双性视角的呈现在宋碧云汉译本中具体表现为传统译学视角下阴性译者属性与个人意志引导下主体意识间的融合, 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删改增注, 切断作品与原作者间的文化脐带, 从而得以将译作划归其所有的过程。在宋碧云对《啼笑皆非》汉译过程中, 这种译者的能动性则具体表现为译本的主体选择和译语的“她者”操控。

(1) 译本的主体选择

不同于一般受制于发起人、赞助商的任务型翻译, 宋碧云在选择其翻译作品原材料时往往以其个人喜好为首要条件, 主动选择其所青睐的作者作品加以翻译, 并在翻译过程中偶有删改着色, 为译作增添些许个人印迹, 使得作品意蕴得以延伸。在其译后言中, 宋碧云耗费过半篇幅用于介绍林语堂及其作品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的创作背景, 时间准确、细节明晰, 对林氏“出言之爽直”“造句之幽默”大加赞赏; 她更直言其搜寻原作时所耗精力之巨, “经多日奔走始借到一本”方得以先睹, 因“读后深以为快”终“决心译出以资介绍”, 并于1945年4月初步结笔(宋碧云, 1980: 163)。

相较于对原作者及作品背景的巨细靡遗,宋碧云在译者序中非但未对其翻译过程大加阐述,反而仅用“择其精要”“略有删减”等寥寥数语予以概括,这与其翻译《苏东坡传》时所作译序中多次谈及翻译之难、“还原”之艰的真情流露存在着相当的反差。此外,宋碧云作为译者在整理文本内容时有意识地删去带有林语堂个人政治观点的描写,对某些敏感章节予以完整删除,其中即包括 *The Suicide of Greece* (第4章)、*Churchill and Pericles* (第5章)、*World War III* (第6章)、*The Future of Asia* (第13章)、*Peace by Power* (第14章)、*The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Age* (第19章)、*Origin of the Mechanistic Mind* (第20章)、*Science to the Rescue* (第21章)在内的8章。更有甚者,为确保其译本的政治中立,宋碧云对其余所剩15章中但凡稍有言及帝国强权、国民怨愤等内容也一并予以抹杀。而翻阅林语堂的文前自序,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因政治敏感被惨遭删减的内容正是林语堂意欲唤醒民众反对霸权的主旨所在。两相对比,宋碧云对文本的操控不可谓不明。在历经如此大篇幅有目的的删改之后,译作已然不再附属于原作,其意识形态也完全脱离作者掌控,作者与作品间的脐带至此被骤然切断。而作为译者,宋碧云在翻译过程中明显带有“雄性的”“类作者”的主体意识,不甘隐身于原作之下,听命于作者意志,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入侵”(aggression)和“吸收”(incorporation)对文本内容予以二次加工,赋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意义,同时肩负起创作者与翻译者的双重责任。由此所见,这种带有明显侵略意味的翻译方式正是其“雌雄同体”译者身份的一大展现。

(2) 译语的“她者”操控

林语堂在原作中将目标读者定位于士大夫精英型读者人群,而宋碧云则将目标读者定位于普通大众。因此,在译语处理上刻意选择了一般受教育者所能接受的并带有西方语言色彩的白话文形式,虽受时代影响偶有飞白交织,但宋译在总体的遣词造句上仍能保持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特质。

例(1) *Peace is rich, peace is satisfying, peace is growth and movement and action and life. Peace is as natural as harmony because it is the normal way of man; man rejects war as he intuitively rejects discord or dissonance in music. And the psychology of domestic peace, national peace, and world peace cannot be very different—it is merely the harmon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For that harmon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re is a technique. Human philosophy should occupy itself exclusively with that technique of social harmony.*^①

① 本文英文例句均引自林语堂的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1943年出版。

译文: 和平是富足, 是满足, 是生长, 运动, 行动和生活。和平与谐和一样自然, 因为那是人们的正常方式, 人们反对战争正如直觉的反对音乐的不调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 国内和平, 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只是社会关系的谐和。那种社会关系的谐和便有一种技术。人类哲学就可完全包括社会谐和的技术。^②

作为译者, 宋碧云竭力保留原文句式, 试图将英文句法引入中文表达之中, 并竭尽所能消除其国学思维可能产生的一切影响, 对汉语所固有的成语短句一一予以回避。正是在这种主体意识的影响下, 译文呈现出相当的西化倾向, 不仅在断句标点等处与英文表述做到几近一致, 更在词汇短语层面保留了原文所独有的异语特征。以首句“Peace is rich, peace is satisfying, peace is growth and movement and action and life”为例, 译者对原文句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刻意模仿, 不仅保留了原文中“Peace is rich, peace is satisfying, peace is growth”的平行结构(parallelism), 更采取二字词格式将其译作“和平是富足, 是满足, 是生长”, 使得原文中因单字停顿所产生的短促激昂的音韵效果得以重现。而这种针对原文音响效果所展开的刻意的音韵模仿在“movement”“action”“life”等词的处理上也概莫能外。为消除传统文化对白话文表述的影响, 降低目标读者的阅读障碍, 宋碧云在翻译“the psychology of domestic peace, national peace, and world peace”时刻意回避了汉语中固有表述, 即《礼记·大学》中“治国齐家平天下”这一古语, 转而选取了较为生硬的“家庭和平, 国内和平, 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的表达方式, 避免了目标人群因国学积淀薄弱而可能造成的阅读困难, 使译作更符合特定时期一般受教育者的理解范畴。而将“the harmon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译作“社会关系的谐和”也正是出于此种考量, 相较于林语堂自译本中所采用的“人伦中和之道”, 宋译本的表述似乎更贴合当时普通台湾民众的阅读习惯, 其简明直白的表达或许正是该译本在市侩大众中得以顺利流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 作为女性, 宋碧云在面对原文多处出现的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表述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 于是在采用中性词语对此类表述予以替代之余, 更间或夹杂调侃讥讽之意。在译者看来, “一切的翻译就已经是解释”, 而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个“解释的过程, 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洪汉鼎, 1999: 12), 因而翻译中所出现的意义更改, 实际上只是译者对语词二次能动阐述的结果, 由此在合理范围内的一切重释似乎都可被接受。

^② 本文中例句和引用均引自宋碧云所译《啼笑皆非》, 1980年出版。

例(2) On it, too, there are tipsy *heroes*, *kings* who forget their parts, scenes which obstinately stay up in the air, prompters' voices sounding above everything, *danseuses* who create extraordinary effects with the poetry of *their* legs, and costumes, which are the main thing.

译文: 那上面也有喝醉了的主角, 忘记剧词的皇帝, 挂在半空中拉不上去的布景, 压倒一切的题词人的声音, 舞蹈者以他富有诗意的大腿创造出意外的效果, 还有服装, 乃是主要的东西。

为增强文中的舞台效果, 林语堂大胆地为其中人物贴上了性别标签, 将“英雄”“帝王”等人物以男性形象的“*heroes*”“*kings*”加以代指, 对“舞者”则采用极具女性意味的“*danseuses*”(女芭蕾舞演员)予以描述。经此渲染, 一副红男绿女、纸醉金迷的浮世乱象跃然纸上, 读者只需浅尝便可体味其中的暧昧与情色。身为作者, 林语堂为追求艺术效果对文中角色冠以性别特质自然无可厚非; 作为译者, 宋碧云为破性别歧视对特定词句加以中和弱化也同样无可争议。考虑到“*danseuses*”这一法语词汇所天然带有的女性特指, 如果顺应原文将其一字不改地译作“舞女”, 并放置于上下文所营造的香艳场景之中, 必然会造成读者对女性舞者的另类遐思, 极易产生例如“交际花”“脱衣舞娘”等不良联想。为消除这一词句可能导致的性别歧视, 宋碧云在翻译过程中自然地将其弱化为“舞蹈者”进行阐述, 同时为反击男性作者的调笑取乐, 更是创造性地将“*their*”这一中性复数人称代词译作男性单数的“他(的)”, 刻意强化“舞蹈者”一词的男性色彩, 对文学作品中的男性霸权予以有力的回击。由此不难推测, 在作为女性的宋碧云看来, 在当时既有社会文化背景下, 只有女性主体在译作行文间夺回其平等于男性的社会身份, 译作才更易获得世俗大众的认可, 以创造出不同于原作的“二次生命”, 而正是在这种与原文词句表述的对抗中, 译者赢得了其作为翻译活动合作者的平等权益, 最终得以与作者比肩同行。

2. 受动性: 矛盾交织的译作

费尔巴哈(1961: 9)指出, 人的自我是一种有形体的存在, 其“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 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作为生活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人”, 宋碧云在翻译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时虽竭力发挥其作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在译本结构、部分词句等方面进行了尽可能的删改替换, 但由于外界政治、社会、文化及自身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其翻译过程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束缚, 其作为译者的受动性特征也由此暴露无遗。同时, 由于作者写作目的与译者翻译动机之间的本质差异和作者认知与译者理解上的不对等, 使得宋碧云难以在其所处特定历史时期重现原文的每一处真情流露成了无奈的必然。

(1) 写作目的与翻译动机之间的矛盾

身处乱世，作为近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之一，林语堂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1943年将其一腔热血和满腹忧虑化作振聋发聩的铮铮大字，以*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为名整理成册在美出版。在其华人身份和汉学底蕴的双重影响之下，林语堂在创作中大量借鉴中国经典古籍中的哲学思想，从孔孟之道谈至老庄思想，试图通过东学西渐之法，“打破唯物观念，改造哲学基础，复建精神与物质之平衡配合”，从而使“人道主义得以超越自然主义之上”，“人道得以重立于人间”（林语堂，2010：2）。1944年，怀揣着醒世救民的美好愿望，林语堂携其与徐诚斌合译的中译本回到国内，于重庆等处进行巡回宣讲，试图将其政治主张通传于人民，以达到振兴中华、抵御外侮的目的。但由于其早期作品所坚持的“个性解放”式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与当时国内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导致林语堂及其作品一直饱受左翼作家的批判，因而《啼笑皆非》在国内传播时颇为不顺。不仅《新华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均刊登相关文章加以批驳（万平近，1987：36），郭沫若更是专著《啼笑皆是》一书特此抨击，将林语堂视作为“一位穿西装、吃大菜、在中国用英文演讲的摩登辜鸿铭”，认为其“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一点洋泾浜的外国语文，捡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着实惹人鄙夷（郭沫若，1992：400~402）。西方议评者更是将该书比作“一道满是淀粉、酸臭难当的餐食，闻之令人作呕”（Fernandez, 1943：581），认为该书中对西方强权国家的“指控过于夸大”，“非但不能唤起人们对于中国的同情和尊重，反而会引发不快”（Farley, 1943：193）。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林语堂被迫放弃国内宣讲，其作品也至此被“打入冷宫”数十年之久。

不同于林语堂的慷慨陈词，宋碧云并未对文中的政治色彩多加渲染，反而进一步予以弱化，竭力保持文本的政治中立，其翻译动机只在展现作者“儒道哲学思想”及其对“国际局势之分析”（宋碧云，1980：164）。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据其译后序中所言，宋碧云在翻译该书之时“仅择其精要处译出十六章，各章中意有删减，惟仍不失原意”（同上）。由此可推，在宋碧云看来其所删去的八章内容不但略显多余，不属其“精要之处”，更游移于“原意”之外，因此对原作立意无足轻重，这种态度与其在译后言中对林语堂政治观点的只字未提实是一脉相承。这种写作动机与翻译目的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宋碧云在其译作的正文中夹杂主观译述现象的产生。

例（3）前节叙至美国若干学者言论家主张世界人民分为「讲英语者」及「不讲英语者」两种，作者认系荒谬不经，因世界多民族均不讲英语，前节结语为「我

们不能逃开历史也不能从历史中学习」——译者注。

宋碧云在文内夹杂此注，看似用于解释所删章节内容，实则意在言外，是其急欲抹去作者原意、消除政治色彩的不二表现。在原作中，林语堂耗费近20页篇幅大谈亚洲未来、美国强权，意图揭露英美各国在殖民统治、对日宣战等问题上的首鼠两端和阳奉阴违，更是第一次将西方列强心中秘而不宣的“中国威胁论”摆上明面，以解释其“封锁滇缅路、削弱中国实力”之缘由（林语堂，2010：105）。宋碧云的译注不仅改变了原文的文本内容，还极易造成普通读者对原作政治立场的误解。借由原作，林语堂揭露了英美两国试图在战后“借联邦之名，行独霸之实”的政治意图（同上：118），更是直指中英两国在香港殖民地问题上早已“渐趋不合”，因此才在第十四章（Peace by Power）末尾处以“不将世界分成两个军营，怎能将世界人类完全消灭”加以讥讽。而以上种种，宋碧云在其1980年正式出版的译作中均一律予以删除，只用不痛不痒的“美国若干学者言论家主张世界人民分为「讲英语者」及「不讲英语者」两种，作者认系荒谬不经，因世界多民族均不讲英语”等只字片语含糊而过，其受当时政局束缚之深可见一斑。

自1947年“2·28事件”爆发至1987年7月正式解除戒严的40年间，台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其民众长期处于人心浮动、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在此期间，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仅仅因为当局对其可能存在的“亲共、反党”情绪的猜测便惨遭屠戮，而在这些受害百姓中不乏文人学者和乡绅名流（Huang, 2005）。而在1949年爆发的“四六事件”“《光明报》案”中，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及基隆中学等当地名校均陷入国民当局为肃清异端、控制民愤而刻意制造的政治风暴之中，一时间台湾学界文坛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毕业于台湾大学、时任中学教师的宋碧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来自台湾时局的影响，在除去文本内容大篇删减之外，为进一步中立译作的政治立场，更是对文中所出现的部分敏感词语进行了相当的改动，在删除之余还对其中难以规避的词句进行了中性替换。

例（4）In other words, while force cannot succeed in Hitler's hands, it can succeed in *Anglo-American* hands. *If this is the sum of wisdom that guides men's actions in politics, then the picture is dark indeed.* It simply means the assumption that after the war, the world must be frightened by 50 000 *Anglo-American* planes and 200 000 pilots. But suppose *China* refuses to be frightened, *Russia* refuses to be frightened, and the world refuses to be frightened. Then what? Go out and bomb them after the war? What childish simplicity!

译文：换句话说，假如武力在希特勒手中不能成功，在别人手中一定可能。这简直就是假定战后这个世界一定要被某方的五万架飞机和二十万航空员吓住。可是假定甲国不受吓，乙国也不受吓，全世界都不受吓，怎么办呢？等战后把他们炸掉吗？多么幼稚！

在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一书正式发行的两年之后，即 1945 年 6 月，联合国制宪会议于旧金山举行，中、美、苏、英、法五国依据《联合国宪章》正式成为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世界新格局至此重新奠定。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大通过 2758 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就此正式退出联合国，彻底失去了其在国际政坛中的话语权。在随后的数十年间，随着美国岛链战略的实施、海峡两岸关系的动荡、岛内蓝绿阵营间的交锋，彼时的台湾只得仰人鼻息，残喘度日。身处于如此破败光景，林语堂原文中所渲染的美国将走上希特勒的老路，凭借飞机大炮之武力优势进而胁迫中、苏等国的战事描述及而后林氏的种种逆耳劝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台湾当局和普通读者看来难免有不合时宜之感。正是在这种时政格局的微妙影响下，宋碧云将原作中所出现“Anglo-American”及“China”“Russia”分别替换为中性的“某方”和“甲国”“乙国”，使得原作中对未来政局的不实猜想得以隐去。为进一步确保文作的政治中立，宋碧云甚至未对此次修改进行任何的标注说明，夹注后序无半点痕迹。在如此严谨刻意的修改之下，除通晓时局的政客学究之外，普通民众实在难以透过译作获取更多的政治讯息。由此，在受动性的作用下，宋碧云完成了对原作政治立场的改造，化解了作者写作目的和译者翻译动机之间的矛盾。

（2）作者认知与译者理解之间的矛盾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般同时具备多种身份，急需调动自身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等文学能力”，“将作品‘召唤结构’中的‘未定点’‘空白点’具体化”，并调整自身“先结构”，以期达到与作品的“视界融合”，最终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建构”（查明建、田雨，2003：22），但这种调整并不总是成功的。身为原作者，林语堂对其作品内容自然了熟于心；而作为译者，宋碧云则难以跨越认知的隔阂获得类同于作者的全知视角，无法对文本信息中的每一处作出准确的解答，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时出现纰漏和误解，虽难以避免，但也多少有些遗憾。

例（5）Democracy's reply to Prohibition was *the speakeasies*. The history of the speakeasies is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exactly how much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stand for *verboten*, and of how they would obey even laws passed by themselves!

译文：民主对限制的回答便是随便讲。随便讲的历史，正是美国人民忍受限制的程度及对他们自己通的法律如何遵守的光荣历史。

为嘲讽美国人对本国法律的阳奉阴违，林语堂特意引入“the speakeasies”一例，以作强调。20世纪20年代，在清教教义和妇女运动的双重影响下，美国于1920年1月17日正式颁布其宪法第18号修正案（即“禁酒法案”），规定除在自己家饮酒合法之外，制造、贩卖乃至运输酒精含量在0.5%以上的饮料均算违法。“禁酒法案”直至1933年12月5日方才正式废止。在此法案执行期间，美国民众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私下贩售、酿制酒饮，而地下酒吧（“the speakeasies”）、淡啤酒（“the near beer”）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相较于常年旅居海外的林语堂，宋碧云在英美见闻上明显处于劣势，一时之间难以理解“the speakeasies”一词背后的特殊指代含义，而是受台湾当局整肃戒言政策的影响，将其错解为“speak”和“easy”的合成词，简单地取其各自的字面意义，将其释义为“随便讲”。除了在“the speakeasies”一词上有所错译，宋碧云在处理“verbotens”时也似欠考量。原文中，为突出“verbotens”专指“禁酒法案”这一事实，林语堂特意采用斜体对该词进行了强调处理。而在译文中，宋碧云因认知能力所限，将其粗略译作“限制”，且未采用斜体、加粗或引号等加以强调，虽译文保留了该词基本语义，但造成了其文化内涵的丢失。正是在这两个词上的错漏，直接导致了整段内容的语意错解。宋碧云的这种随机应变的阐释法虽有足够新意，但在不经意间却造成了文意上的巨大偏差，不仅给目标读者造成了相当的阅读困难，更造成了原作信息和蕴意的走失。

例(6) The establishment of rituals gives a well-defined sense of order and discipline, while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peace among the people. When good taste is distinguished from bad taste, then we have the means of distinguishing the good from the bad people, and when violence is prevented by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good men are selected for office, then the government becomes stable and orderly. *With the doctrine of love for teaching affec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duty for teaching moral rectitude, the people will then have learned to live in a moral order.*

译文：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

受其自身“东学西渐”意识的影响，林语堂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将部分针对中国古籍文书的翻译融入其作品之中，写译结合，使其作品极富东方国学底蕴。在肯定林语堂作品价值之余，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写译夹杂的作品势必会造成

译者的翻译负担。由于翻译过程可能存在的语意缺损及原作缺乏相关注解等原因，宋碧云在翻译作品时常遇到不小的阻碍，在费时费工之余，更为可能造成的考证遗漏埋下了隐患。如例（6）所示，宋碧云在翻译时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证，并在《乐记》中找寻到了确实对应的记载，但受其自身文化认知所限，即使是在如此严谨考证的前提下，其译本中仍然缺少了“With the doctrine of love for teaching affec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duty for teaching moral rectitude, the people will then have learned to live in a moral order.”一句的汉译（即“仁以爱之，义以和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不失为一种遗憾。除了漏译，宋碧云还在处理译注时存有谬误。

例（7）And after his death, *Cleon* the leather merchant, *Eucrates* the rope-seller, and *Hyperbolus* the lampmaker babbled. They were all good democrats and *Cleon* was a good general. It was left only for the insolent public idol, *Alcibiades*, to complete the suicide of Greece.

译文：在他死后，皮革商克里昂（Cleon），绳索商尤克拉梯斯（Eucrates），与制灯者海泼波卢斯（Hyperboaus）便都喋喋不休。他们都是很好的民主主义，克里昂还是个好将官。最后还时那盛气凌人的社会偶像阿西比底斯（Alcidiades），使希腊灭亡。

该例中，宋碧云为凸显其译作身份，减轻读者负担，将原文中所出现的人名以音译注名相结合的方式一一进行了标注。但对比原文，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四处加注中竟有三处拼写错误，即将“Cleon”错注为“Cleen”，“Hyperbolus”误拼为“Hyperboaus”，“Alcibiades”错写成“Alcidiades”。宋碧云曾坦言：“翻译林语堂的作品，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同时因为作品背景是中国的缘故，因此既“不能音译，也不能意译”，只好采用“笨办法”，“依照林先生所列的参考书目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往下翻”，“有时译一页原文，动笔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查资料倒花了五、六个小时”（宋碧云，2015：5）。即便译者如此尽心尽责，其译作仍难免错漏，这让我们遗憾之余深感翻译工作之不易。

3. 为我性：作者视野与读者期待的融合

作为一位“诚于译事”的女性译者，宋碧云在翻译该作品的过程中极力凸显其译者身份，并试图打破作者对文本的垄断，在译作中参杂了大量的文内夹注，促使译本与原作相脱离，成为具有独立文本意义的全新作品。在性别主义翻译理论看来，译者应忠实于“写作计划”（writing project）而非原作本身，因此翻译过程实质上是译者与作者的“合谋”，是译者自身“读者”“译者”“作者”

三种身份的交融,更是译者作为“作者”的创作视野与其同一般“读者”所共同拥有的阅读期待的融合。正是在这种视阈融合的作用下,宋碧云在翻译时夹杂了大量的文本评注,而其中部分评注已然超越了传统译论对注解的界定。

例(8)……译者注:因未觅得法句经中文译本,故仍从原书英文译解,当极不似经文。著者所据谅系 Max Muller 所译之牛津本,考法句经又名云钵偈,二卷,法救尊者造。

如例(8)所示,译者为描述翻译细节,不惜违背译注内容应“仅限于必要的背景知识”、避免与“理解小说内容和欣赏其艺术无关的考证”(乔伊斯,1996:1070~1072)这一准则,有意识地在译作正文中直接插入译者注。这一举动,不仅破坏了作品上下文间的固有语义联系,还使得读者在阅读时无法忽略其作为译者的主体存在,最终促使其译作中出现了译者与作者共存、文本与译注共融的奇异景象,而此种现象在文中多处均有体现。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即意识形态系统服务的”,因此“任何违背‘当下’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译本都是无法以正当的途径出版、发行和传播的”(潘平亮,2005:126)。作为译者,宋碧云的翻译目的极为明确,即“择其精要”译出,试图使其读者能够于其译作中体悟林氏于其原作中所体现的“以国际局势之分析辅以儒道哲学之发挥”的写作风格,仅求“得一深刻印象而已”(宋碧云,1980:164)。正因如此,为确保其译作能在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阴影下的台湾顺利发行,宋碧云删改了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不仅将林语堂对西方霸权的控诉全盘抹杀,还将字里行间对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影射一并删去,使译作成为一个无政治倾向、无历史牵扯的“中性化”作品。

同时为进一步凸显译本的政治正确,该译本更是极具创造性地增添了林语堂于1957年写就的《林语堂自传》中的部分节选内容以作补充。节选内容从童年回忆、出国留学言至宗教信仰、著书立传、个人追求,事无巨细,几乎包罗万象,但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之中竟无一处与前文内容有所相关,实在令人费解。在增添这整整50页的自传之后,全书总页数(共205页)才得以与原作(总计216页)相接近。借由此举,宋碧云不仅弱化了其译本历经大幅删改这一事实,更冲淡了作品中所残留的些许政治色彩,使得其译作更接近于单纯的文学作品,而非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政治宣传文本。一系列的删改增注使宋碧云获得了平等于作者的“写作计划”合作者的身份,使其作为“作者”的创作视野得以与普通民众的“读者期待”相融合,并最终促使其作品得以顺利出版发行。

结语

通过对《啼笑皆非》宋碧云译本的实例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时局、文化环境及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美学态度及性别意识等都会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似乎均可借由译者主体性这一理论视角得到较为合理的解答。作为译者，宋碧云的译者身份和女性意识促使其通过翻译获取接触时局、引领思潮的机会，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主体意识又使得她渴望凭借翻译去改变现行的社会，正是在这种作者意识与译者动机相矛盾、时代背景与作品意识相冲撞的背景之下，其翻译作品才获得了独立的文本身份和文化价值。借由语言层面的操控，宋碧云得以对原作不合时宜之处进行了调整，对其中部分词句语义加以补充延伸。虽因其自身认识和外界环境等因素影响，其译作中仍尚存些许不足之处，但总体瑕不掩瑜。或者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译语操控、身份再造、文本重建的过程中，时代作品方能获得其不同以往的全新文学价值，从而在新时期背景下获得重生。

参考文献：

- [1] Chamberlain L. Gender and the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 [J] .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 Society*, 1988, 13 (3) : 454~472.
- [2] Farley M S. Reviewed Work :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by Lin Yutang [J] . *Far Eastern Survey*, 1943 (12) : 193.
- [3] Fernandez R. Book Review : “Between Tears & Laughter” [J] . *America*, 1943 (69) : 581.
- [4] Huang T-I. White Terror Exhibit Unveil Part of the Truth [N] . *Taipei Times*, 2005-05-20.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5/05/20/2003255840>.
- [5] Lin, Yutang.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M] . New York :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3.
- [6]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7] Vermeer H J.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A] . In Venuti L (Ed.) .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 221~232.
- [8]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 [9] 陈大亮. 谁是翻译主体 [J] . 中国翻译, 2004 (2) : 3~7.
- [10] 陈蕙荃. 文学翻译中的自译研究：以林语堂《啼笑皆非》为个案 [D] . 杭州：浙江财经大学, 2009.
- [11] 方梦之. 译学辞典 [Z]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 [12]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 [13] 冯小巍. 《老人与海》海观译本和宋碧云译本语言风貌对比[J]. 语文建设, 2015(7): 60~61.
- [14] 冯欣欣. 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研究——林语堂译本与宋碧云译本的比较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1.
- [15] 郭沫若. 啼笑皆是[A]. 郭沫若全集第19卷[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 [16] 何明霞, 汪桂芬. 《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译风比较[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349~351.
- [17] 洪汉鼎. 真理与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18] 霍郭浩. 基于语料库的《苏东坡传》汉译本译者风格比较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5.
- [19] 李文静, 穆雷. 翻译性别他/她者——论译者的双性视角[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3): 97~101.
- [20] 林语堂. 啼笑皆非[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 [21] 林语堂. 啼笑皆非[M]. 宋碧云译. 台北: 远景出版社, 1980.
- [22] 林语堂. 苏东坡传[M]. 宋碧云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 [23] 潘平亮. 操控? 反操控?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5): 124~128.
- [24] 屠国元.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2003(6): 8~14.
- [25] 万平近. 林语堂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26] 吴任玉. 关联理论视角下《老人与海》两个中译本对比研究[D]. 株洲: 湖南工业大学, 2012.
- [27] 夏贵清.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89~92.
- [28]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29] 余健明. 海明威风格汉译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 [30]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的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19~24.
- [31] 詹姆斯·乔伊斯. 尤利西斯[M]. 金隽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32] 赵佳佳. 基于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的译者风格研究——两个汉译本分析[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 [33] 仲伟合, 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7): 42~46.

收稿日期: 2016-07-11

作者信息: 黎昌抱, 浙江财经大学, 310018, 研究方向: 翻译学、文学自译、语料库翻译学、修辞学。

电子邮箱: changbao@hotmail.com

李菁,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310018,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An Androgynous Translator :
A Study of Song Biyun'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LI Changbao / LI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by taking Song Biyun'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as an examp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androgynou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er time on the target text reconstruction from such five aspects as choice of source text, manipulation of target language, motiv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cognition of the translator and fusion of horizons. It holds that the translator is the very translation subject acting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ource text as well as its writer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a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fact, results from the joint action made of his/her political stand, cultural background, value prioritie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where he/she lives, so that it is inevitable for the translator to manipulate and modify somewhat the source text regarding its textual meaning, textual structure and even its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refore,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likely to be clearly described in terms of his/her intentional manipulation of the text and his/her thinking path. In this sense, the translator's manipulative modifications of this kind would impos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arget text and pump a new life into the source text originally created in a given era.

Keywords: Song Biyun;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rogyny